

逡巡于文与史之间

QUNXUN YU WENYUSHI ZHIJIAN

—TANGDAI ZHUANJI WENXUE SHULUN

——唐代传记文学述论

◎ 谢志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逡巡于文与史之间

QUNXUN YU WENYUSHI ZHIJIAN
—TANGDAI ZHUANJI WENXUE SHULUN

——唐代传记文学述论

◎ 谢志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逡巡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 / 谢志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50 - 1

I. ①逡… II. ①谢… III. ①传记文学评论 - 中国 - 唐代
IV. ①I20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93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许继起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摘要

唐代史官文化发达，文学繁荣，人们的史学意识浓厚，创作欲望强烈。本书将唐代传记文学置于繁盛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出唐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阐明了唐代传记文学与《史通》、古文运动精神实质的相通相契，认为《史通》和中唐古文运动的开展标志着唐代史官文化的成熟。初步考察了唐代主要传记文学作者的构成情况，并由此引发出对传记作者的本体思考，进而论述了唐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原因，分析了唐代传记文学的“传主”构成情况。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揭示了唐初“八史”的传记艺术，认为唐初“八史”尤其是其中的《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史传不仅在思想上注重“以史为鉴”，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文学性，具有文史交融的特点。唐代“传”记文以儒家精神为思想底蕴，在某些自传性质的“传”记文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追求隐逸的出世思想，更在传记艺术上继承前代史传文学精神并有所创新，“寓言性”传记、“滑稽性”传记、唐代“小说性”传记反映出唐代“传”记文的新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塑造了一代高僧玄奘的生动艺术形象，着重论述了此传记在艺术手法上的诸多创新。本文从情感表达角度展开对唐碑志的论述，认为唐碑志极为注重情感的表达，一改历来碑志生涩枯燥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对唐碑志的“谀墓”，认为应给予“同情”的理解。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historian culture,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the people had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a strong desire to create. The book places Tang Dynasty Biography in the prosperous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o be examined, revealing the unique art charm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Tang Dynasty Biography. The book describes the similarity of biography of Tang Dynasty, the “Shi Tong ” and essence of classical literary movement, “Shi Tong ” and developing of the classical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marked the maturity of official historian culture. The book Preliminarily studi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in writer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nd thus leads to thought of the biography authors himself,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Biography, composition of “Biography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Biography. This book reveals the biography art of “Eight histor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oth from the Thought and Art, which focus on “learning from history” Not only in the ideological, but also showing strong literary, with a characteristic of blending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Tang “Biography” thought the Confucian spirit as the background of idea, and in some “Biography” with autobiographical nature, showing a degree of ideological pursuit of the birth of seclusion, but also in the art of biography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previou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Be innovative, “fable” biography, “funny” biography, and “Fiction” biography reflected the the text of the new changes of “Biography” in Tang Dynasty. “Great Mercy Temple Tripitaka Master Biography” shaped the vivid artistic image of a generation of monk Xuanzang, this biography focused on much artistic innovation of the biography. This book from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the discuss on Tang epitaphs, which very focus emotional expression, with a strong emotional colors, and a change in the image has always been boring and jerky, while the “flatter tomb” of Tang epitaphs should be giv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

目 录

绪论	(1)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
二、研究基础及现状	(6)
三、研究思路及价值	(14)
四、结构及内容安排	(15)
五、创新之处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6)
第一章 背景论：史官文化浸润下的唐代传记文学	(18)
第一节 唐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	(18)
一、唐代学术文化的繁兴景象	(19)
二、科举制与唐代传记文学	(22)
三、史官文化与唐代传记文学	(24)
第二节 《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	(29)
第三节 古文运动与唐代传记文学	(38)
一、唐代史传文学的“古文运动”精神实质	(38)
二、《史通》的“尚实”精神与古文运动	(41)
三、古文运动对唐代散传创作的影响	(43)
第二章 作者论：唐代传记文学创作者的总体考察	(46)
第一节 唐代传记文学作者的构成分析	(46)
一、唐代史传文学作者及其构成分析	(46)
二、唐代散传作者及其构成分析	(52)
第二节 唐代传记文学作者的本体思考	(56)
一、“惩恶劝善”与“直书”的体认	(56)
二、个体与群体的并举	(58)
三、良史的标准：史才与史德	(61)

第三节 因何而“传”：唐代传记文学创作原因分析	(66)
一、以史为鉴，扬善惩恶	(66)
二、补缺和辩诬	(68)
三、留名青史和扬名后世	(70)
第四节 为谁而“传”：唐代传记文学的“传主”分析	(71)
一、“传”有功名者	(72)
二、“传”奸佞、叛逆之人	(74)
三、“传”高官	(75)
四、“传”社会之代表人物	(76)
第三章 文与史的交融：唐初“八史”传记文学价值新论	(79)
第一节 “以史为鉴”的经世思想	(79)
一、“帝王之兴，累功积德”	(80)
二、“不有君子，何以能国”	(82)
三、以德化人，“孝”治为先	(84)
第二节 “文史交融”的史传创作实绩	(87)
第四章 继承与新变：唐代以“传”为题的传记文学述论	(101)
第一节 唐代“传”记文的分类	(102)
第二节 入世与出世：唐代“传”记文的思想内涵	(106)
第三节 唐代“传”记文的文学性	(112)
一、人物群像的塑造	(112)
二、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	(113)
三、尚“奇”之意趣	(117)
四、情感的真挚浓烈	(121)
第四节 唐代“传”记文的新变	(126)
一、唐代“寓言性”传记：以寓言而言理	(127)
二、“滑稽性”传记：以韩愈《毛颖传》为代表	(129)
三、唐代“传”记文的“小说性”	(130)
第五章 佛界“传”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传记艺术	(137)
第一节 佛界奇人	(138)
一、人品出众，天资聪慧	(138)
二、舍命求法，坚毅不屈	(139)
三、从普通僧人到佛界圣人	(141)

第二节 “传记” 奇事	(143)
第三节 传记奇葩	(150)
第六章 以“碑”传情：唐代碑志的情感世界	(162)
第一节 唐代碑志概说	(163)
第二节 唐代碑志的情感表达	(166)
第三节 “谀墓” 再论：以韩愈碑志为中心	(183)
结论	(188)
参考文献	(190)
后记	(205)

绪 论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异常发达，确立了优良的文体传统。传记文学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文类，其概念显得有些复杂，其使用和理解存在不少混乱。因此，对何谓传记文学、何谓传记、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何在等问题的厘清，是我们研究、探讨唐代传记文学所必须做的首要工作。

1. 何谓传记

我国古代并无“传记文学”一词，传记文学的概念是后起的，而在其名称出现之前，有“传”、“传记”等文体名称在沿用，其概念内涵不尽相同。《说文解字》云：“传，遽也。”段玉裁认为，“传”与“遽”可互训，“传”即是传车驿马，这是“传”的本义。汉代经学勃兴，因解经需要，赋予“传”以释经的功能。《尔雅》云：“传，传也，博识经义，传示后人也。”刘勰《文心雕龙》云：“常道为经，述经为传。”章学诚《文史通义》亦云：“传记之书，其流已久……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①可见，从汉代到清代，“传”之含义引申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虽然明代徐师曾云：“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其中透露出些许人物传记的因素，但总体上讲，此时“传”的含义并没有与“传记文学”建立直接的意义联系，而作为经的附庸的“传”，就其精神意绪而言，在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古代史学甚是发达，却很长时间依附经学，这样一来作为传记文学重要门类的史传文学也依附经学，这使得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史记》是司马迁的史传文学杰作，但他多次表示它是继《春秋》所作，班固亦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史记》列入“儒家者流”，史传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可见一斑。受经学的影响，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总体上注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页。

重政治道德、伦理教化的功能。李祥年先生云：“中国传统的人物传记创作，其大多侧重于借助人物的传述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也不能不说这是因受到了‘释经’意识的影响。”^①可谓一语中的。

“传记”一词在汉代出现时亦与“经”相联系，主要指的是释经的著作。其含义到南朝开始发生变化。《宋书·裴松之传》云：“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鸠集传记，增广异文。”此“传记”应包含人物传记等有关史料，始与人物相联系，具有传记文学的某些元素。但我国古代对“传记”含义的认识总体是模糊的，甚至对“传”、“记”的理解都是分而为之，如在史书传记类中常将“传”和“记”分为两个类别加以区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②代表了我国古代对“传记”含义的基本理解。可见，我国古代的“传记”与今日“传记”概念并不等同，与传记文学亦相差甚远。我国古代“传记”应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管是“传”还是“记”，只要是与写人记事有关的文字，都被归之名下。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

2. 何谓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一词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初，由胡适首先使用。胡适认为：“传记文学是以传记为领域的一种文学，任何与传记有关的文字资料都是传记文学的作品。换句话说，任何有关人的活动记录与思想见解的材料，都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③，立论虽过于宽泛，但他指出了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和“有关人的活动记录”，值得肯定。其后，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以西方传记文学为观照和效法对象，认为“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④。在此基础上，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应当“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⑤。上述学者对传记文学的论述大多来自对西方“传记文学”概念的认同。西方学者对“传记文学”概念的代表性阐述，如英国学者菲利普斯·布鲁克斯认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⑥法国传记作家莫

① 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②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21页。

③ 刘绍唐编：《什么是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④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⑤ 朱东润：《传记文学》，转引自《人物》1982年第1期《问题讨论：关于传记文学的写作问题》。

⑥ 戴维·诺瓦多：《传记理论1880—1970》，普渡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洛亚认为传记文学是艺术品,传记家应“如同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一样,必须从整体中选出最本质的东西,而在作这一选择时又不损坏整体,这样他就完全正确地起到艺术家的作用”^①。《新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传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和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② 从上可见,中外学者对“传记文学”概念的阐述越来越注重其艺术的属性,对“传记文学”概念的界定也愈见明晰。蔡仪认为传记文学“是形象地描写自己或他人的比较完整的或某一阶段的生活历程。它只是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艺术加工,既有艺术性,又有历史资料的价值。传记文学是以人物为中心对象的,特别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形成性格的环境”^③。李祥年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真实地且艺术地记叙某个实际人生的写作样式”^④。韩兆琦认为传记文学“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手段来描写历史的或现实的人物,通过描写真实的人物生平事迹来达到反映社会现实和抒发作者个人情志的目的”^⑤。陈兰村认为传记文学“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⑥。说法不一,其实一致。简单讲,传记文学是以真实人物为中心,艺术地再现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个性、生命情志的一种文学体裁。

古今中外对“传”、“传记”、“传记文学”的论述不尽相同,但结合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由物到人、由史趋文的方向却愈见清楚。朱文华先生认为,为了避免汉语“传记文学”一词可能产生的语义歧义,可将“传记”和“传记文学”统称为传记作品。^⑦ 笔者认为,比“传记文学”概念宽泛的“传记作品”似乎更不便于研究的深入,也略化了传记文学的文学色彩。还是陈兰村先生将“传记”、“传记文学”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别对待更为清楚明白。陈先生认为,“‘传记’名称是一个属概念,其本身能够包括文学与史学两个范畴的作品,它是记录真实人物生平文体的总名称。‘传记文学’则是其中的一种”^⑧。虽然在通常意义上传记和传记文学可以通称,

① 莫洛亚:《传记面面观》,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44页。

②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3卷,“文学艺术”条,1986年第15版。

③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④ 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⑤ 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绪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⑥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绪论),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⑧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绪论),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但作为研究对象的“传记文学”只是“传记”中文学色彩较为浓郁的那一部分，那些不具文学性的“传记”充其量只是“传记”中有关人物的史料，是不能称为传记文学的。

3. 诗与真：传记文学的本质思考

历来对传记文学本质属性的探讨归结于一点：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思考。有的论者认为，“史学的方法与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为是历史范畴”^①，过于强调传记文学的史学属性，而忽略了对文学性的要求。而有的学者受西方近现代传记观念的影响，突出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如董鼎山先生认为：“传记既称之为‘传记文学’，便应有浩荡的文学气概。”^②朱东润先生甚至将“传叙文学”一词取代“传记文学”，其用意明显在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朱文华先生认为：“纯史学性笔法与含有相当文学性的笔法虽然可以并存，但最好是互相取长补短，逐渐靠拢。另外需要明确这样一点，对传记作品来说，宁可拘于史学笔法，而不要受文学的诱惑而过分追求文学手法。”^③其实，史学性和文学性乃是传记文学的两个本质属性，这是其作为一种文体存在的内在要求，偏执于一端而不及其余，只能使其丧失文体的特性。不讲求史学性的“传记文学”不是真正的传记文学，没有文学性的传记文学亦无法传之久远。史学性追求的是传记文学的“真”，文学性追求的是传记文学的“诗”，只有史学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才能产生出真的、诗的、美的传记文学。《史记》堪称文与史结合的史传文学典范，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展现的即是其对“真”与“诗”的艺术追求。周作人曾针对歌德的自传作品《诗与真》云：“‘真实与诗’乃是歌德所作自叙传的名称，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所有的两种成份。”周作人认为，“真”和“诗”是自叙传的必要组成部分，他进而解释道：“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辞描写的地方。”^④揭示出传记文学的真谛。当代学者阎纲先生亦认为传记文学应“以史为骨，以诗为肉，是史的诗、诗的史”^⑤，乃为精辟之论。

传记文学是介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一种文体，有着对文与史的内在自觉

① 孙犁：《与友人论传记》，《孙犁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② 董鼎山：《作为严肃文学的传记》，《读书》1987年第1期。

③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④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后序），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23页。

⑤ <http://www.chinawriter.com.cn>（中国作家网），2009年06月15日。

要求。钱锺书先生在谈到传记文学时有感而说：“忽忽将四十年，浪淘人物，尘埋文字，不复能忆所指谁作矣。风流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稍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①钱先生所说“史蕴诗心”指的是传记文学的“诗”而言。朱东润先生认为：“传叙文学底价值，全靠它的真实。无论是个人事迹的叙述，或是人类通性的描绘，假如失去了真实性，便成为没有价值的作品。真是传叙文学底生命。”^②朱先生强调的是传记文学的“真”。综观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实际，唐代传记文学实是在文与史之间逡巡，或倾于史求其“真”，或偏于文求其“诗”；其总的趋势是：在充分肯定传记文学“真”的本质要求之时，不断追求其文学的“诗”意之美，并留下了许多“真”与“诗”兼具的传记文学杰作。

4.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书将“唐代传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从断代（一个相对完整的时期）的角度考察唐代传记文学的发展状况，探寻其艺术规律，把握其在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所谓“唐代传记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唐代的“传记”，只不过是我们把其中文学色彩较为浓郁的部分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史料性质的考订文字如年谱、行年考，以及艺术性不高的应酬性文字等不在本文论述之列。唐代笔记小说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明皇杂录》等有些篇章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程毅中先生认为唐代小说与杂传合流，“唐人用传记体写小说，或者说用小说手法写传记，就把小说的艺术性提高了一步”^③。唐代笔记小说和传记文学关系复杂，笔者限于学识不易把握，也只好留待今后作进一步探讨。因此，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

唐初“八史”，即唐代初年所修八部纪传体正史：《晋书》、《隋书》、《南史》、《北史》、《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研究重点是其中“列传”部分文学性较强的人物传记，尤以前四部为主。

唐代以“传”为题的传记文学作品数量不多。《文苑英华》有“传”一类，共收唐代“传”记文三十三篇，其余大多散见于唐人别集中，《全唐文》亦多有载录。韩兆琦先生称这类“传”记文为“文学传记”，并将之归入“散传”门类。后世公认为唐传奇的作品，已属小说讨论的范畴，不在本论题的论述之列。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3页。

^②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部唐代的中篇以上为个人所立传记作品。韩兆琦先生根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文“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的说法^①而名之为“专传”。此传以生动的笔墨叙写了唐代佛界高僧玄奘西行求法的行藏事迹，是唐代传记文学的一朵艺术奇葩。

唐代出现了大量的碑志文，主要包括碑碣、墓志铭、行状等作品，虽然其中大部分只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不高，但亦有不少文学色彩较为浓郁的作品，尤其是韩愈、张说、柳宗元、李翱、杜牧等古文大家的碑志文，许多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这类作品韩兆琦先生亦称之为“散传”。

二、研究基础及现状

历代学者对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论述较多，但大多散见于文史著述、文人别集中，自20世纪80年代才有较为专门集中的研究论著问世，而专门以“唐代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尚不多见。唐代之前史传文学成就较高，从唐代开始，杂体传记与史传文学分庭抗礼，其后杂体传记尤其是其中的散传逐渐发展成为传记文学的主体。唐代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唐代传记文学对唐之后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传记文学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现就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综合研究

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很多，其中对唐代传记文学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主要文献成果有：孙昌武的《柳宗元传论》及《韩愈散文艺术论》、吴文治的《韩愈资料汇编》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陈幼石的《韩刘欧苏古文论》及《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乔象锺《唐代文学史》、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高海夫的《柳宗元散论》及《唐宋八大家文钞集评》、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汇评》、张铁夫《柳宗元新论》、韩理洲《陈子昂研究》、汪荣祖《史传通说》、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及《唐代科举与文学》、陈尚君《唐代文学从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考》、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乔象锺、陈铁民《唐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卢宁《韩柳文学综论》、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钱基博《韩愈志》、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胡可先《杜牧研究丛稿》、傅礼军《中国小说的谱系与历史重构》、刘明华《丛生的文体》、李福标《皮陆研究》、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李浩《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蒋凡《文章并峙壮乾坤》、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吴孟复《唐宋八大家古文概述》等，这些综合性的研究论著对唐代文人的传记文学作品多有论述。此外，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柳宗元集》、《樊川文集》、《皮子文藪》等唐人别集的出版，为后人研究唐代传记文学提供了文献基础；韩愈、柳宗元、杜牧、李翱、孙樵、沈亚之等唐代主要传记文学作者的诗文选评著作的问世为研究唐代传记文学创造了便利条件；缪钺的《杜牧传》、王拾遗的《白居易传》、吴汝煜的《刘禹锡评传》等人物评传著作也促进了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乔象锺、徐公持、吕薇芬的《中国古典传记》选录了我国古代大量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柳州文钞）集中了历代对韩愈、柳宗元传记文学作品的评论，是可资利用的极好材料。综观上述著述文献，研究的重点仍集中在韩愈、柳宗元等唐代传记文学大家身上，对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中晚唐文人的传记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总体来讲，对唐代传记文学的研究有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但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不够透彻，如较少有根据唐文的类别比如人物传记类、议论说明类、山水游记类等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我国传记文学研究还处于开创、发展阶段。尽管胡适、梁启超和朱东润分别在北大等学校开设过传记文学的课程，但没有造就出一批传记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80年代初，唐弢指出：“传记文学依旧是学术方面的薄弱的一环。”^①直至90年代，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填补了这一空白，结束了“没有一部传记文学史”的历史。总结我国目前的传记文学研究情况，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韩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对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特征、类别如“散传”、“专传”等做了较为清晰的界定，总体

^① 唐弢：《晦庵序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上勾勒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基本发展线索，同时以专章论述了唐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陈兰村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不仅展现了我国传记文学发展的轮廓，而且突出其演变的历程。并进一步指出了传记文学与其他文体的互动发展，将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延伸到现当代，试图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现当代传记文学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陈兰村主要研究唐初“八史”和碑志传记的艺术成就，并对唐代的自传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此外，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韩兆琦《中国传记艺术》、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谏碑文研究》、陈兰村、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王锦贵《中国传记体文献研究》、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朱文华《传记通论》、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李战子《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新探——自传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等论著的问世，加上王成军、全展、杨国政、李金清、姬沈育、祝杏仙、叶娇、周敏、何元智、郭久麟、赵山奎等学者发表的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传记文学研究论文，推动了我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传记文学的研究还需要大量奠基性的专题研究工作，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

（二）专题研究

1. 史传文学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最早使用“史传”一词，主要于历史著作方面立论，而没有从传记文学角度进行研究。唐代刘知己《史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六家》、《列传》、《人物》、《叙事》等篇透露出一定的传记文学思想，是对唐前史传的系统论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尚不能对唐前史传文学的特征、规律作深刻全面的总结。历代有关史传著作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对《史记》等“前四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如张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张大可《史记研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等，这些研究大多从史学、文章学方面着手。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史记》的研究多关注其文学性，一批有分量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如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史记》的人物传记做了精辟论述；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从多个侧面论述了《史记》的艺术美；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对《史记》的传记艺术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颇多创见；高志明《〈史记〉的文学语言研究》概述了《史记》

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对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做出了总结，并对《史记》的艺术结构、语言艺术及其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有专门论述。此外，可永雪先生《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聂石樵《司马迁论稿》、陆永品《司马迁研究》、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等，都对《史记》的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初开始，对史传文学的研究开始出现新的转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对史传文学有许多精辟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朱东润先生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和实际创作，对史传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该书上篇从文学、美学、文化等层面对史传文学进行本体描述，观点新颖独到；下篇从具体史传作品入手揭示出史传文学的演变轨迹，为今后史传文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以唐前史传文学为研究对象，视野开阔，博览群书，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从传记文学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尤其对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区别进行全面分析，将唐前史传的总特征归纳为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该书立足历史和现实，见解深刻，富于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程千帆先生《先唐文学源流略论（之四）》一文对唐前史传文学的演变轨迹及其艺术规律进行了全面而精当的论述。^①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著作都对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史传文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史传文学研究的单篇论文数量众多，它们和上述理论著作共同推动了史传文学的深入发展。

2. 杂传研究

此类传记自汉代发轫，勃兴于魏晋南北朝，如梁慧皎《高僧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等，它数量庞杂，故称为杂传，又多以类相从，亦可称为类传。杂传乃是作者于正史之外的率尔之作，虽然记人叙事多真实，但大多数作品艺术性较差，其作为一种“传记”形式对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独立发展意义更大。梁代阮孝绪是较早进行杂传创作和研究的人之一，他写有杂传《高隐传》一部，并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录》中设“杂传部”，使杂传进入史部书籍的行列。刘知己《史通》“列传”、“采撰”等篇对杂传有较多论述。唐之后，历代学者对杂传的研究多从文体学角度立论，如明代吴讷《文章辨

^① 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略论（之四）》，《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